

胡乔木对抗日战争宣传与研究的贡献

李良志 鲁书月

内容提要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在抗日救亡高潮时期投身革命，一生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密不可分，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人们知晓的，多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史教育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对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宣传、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等方面的所作所为、贡献，却是知之不多。本文对此作了扼要介绍。从中，我们还可感受到：胡乔木是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者。

关键词 胡乔木 抗战宣传 抗战研究 贡献

一 胡乔木对初期抗战的组织和宣传

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年仅19岁，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并任北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面对破碎的山河，胡乔木积极投身斗争，他组织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经常带头参加游行示威，举行集会，还亲自上街发传单、贴标语等。他的过激行为不久引起校方注意，被迫离开清华。1936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继续从事组织和宣传抗日工作。当进步青年作家萧军写出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遭到国民党当局的

多方压制时,与萧军并不相识的胡乔木却对这本“言抗日”的小说给以高度赞扬。1936 年 2 月 25 日,《时事新报》发表胡乔木的评论文章,他说:“《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①在当时“言抗日”确有“杀无赦”危险的环境下,胡乔木为“言抗日”小说叫好,的确是需要点勇气的。为了反对日本侵略,1936 年夏,胡乔木在上海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青年抵制日货运动,他充分利用英美同日本的矛盾,进行周密布署,在租界和华界进行抵制日货,运动搞得很成功,受到民族资产阶级欢迎。

在上海期间,他曾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青年团(抗青团),这是中共的外围组织,重点在学生中发展团员。胡乔木亲自起草团章,规定从事公开的救亡活动为团员的首要任务。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扣西安,何应钦打电报让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胡乔木得到消息后,就领导“抗青团”团员开展了全市性的反汪活动,写了很多标语,从汪精卫上岸的码头、车站到汪宅,到处贴满了反对亲日派汪精卫的标语。

在上海期间,他还以“开明”笔名为全国学联的机关刊物《学生呼声》写文章,呼吁广大青年学生,立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②中共“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为了在文化方面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乔木奔走、操劳,常常工

①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又见 1936 年 5 月 25 日《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第 23 期,第 2 章第 4 版。

②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 452 页。

作到深夜。

1937年7月,伴随着全国抗战的枪声,胡乔木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曾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担任青训班负责人时,他为该班写了班歌:“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的胸心,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你听见没有?敌人迫害你,群众期待你,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你醒呀!你起呀!拿起你的武器,工作学习。一切为胜利!”^①他在为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起草的校歌中又写到:“记否仇敌未平,破碎河山未整,同胞正在呻吟,天下正待澄清?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种出自由的春花一片。”^②从胡乔木写的班歌、校歌中,我们可感受到胡乔木的一腔爱国热血。

从1941年2月起,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任主席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做为秘书,协助毛泽东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处理有关抗日大事,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从1941年2月到1945年5月,胡乔木仅为《解放日报》就写了35篇社论,其中1941年6月一个月就写了4篇,社论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分析战争形势,批判妥协投降言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人民战争动员。

关于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相应地制订了许多抗日的具体的战时政策,如政权建设方面的三三制,土地革命方面的减租减息,战争时期人民教育政策,还有大生产、精兵简政政策等等。胡乔木作为毛主席的秘书,深切了解党中央的战略布署,对各项政策都作了既深刻又通俗的宣传

①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313页。

②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314页。

报道。

在宣传精兵简政政策方面。胡乔木对为什么要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怎样做到精兵简政? 一一做了分析。他说,“今天,人才有限,物力维艰,而抗战救国,又经纬万端”^①,而日寇对我基本根据地又采用“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生存条件”,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紧缩正是针对着敌人这一毒辣政策而来的”^②;其次是由于敌后战争的需要,因为“敌后战争频繁,战线不固定,部队机关的流动性都很大,不仅庞大的机关为情况所不许,就是在军队中间如果非战斗人员多了,行动笨重也为战争环境所不容”^③,故贵精干,不贵繁多。再次是由于持久抗战的需要,“我们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亦是人民,要开导这个泉源,要巩固这个基础,其关键就在于精兵简政”^④,裁减老弱,缩编部队,充实连队;不十分必要的机关忍痛取消,同样的机关合并,目的是为了“减少脱离生产人员……同时大量发展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只有如此,才能“从老百姓的肩上拿掉不必要的负担,才能维持和发展居民的抗日积极性,坚持长期的敌后抗日战争……才能使军民关系密如胶漆”,否则,“就会动摇持久抗战的基础,有陷入危险境地的可能”。^⑤因此,他强调说,“善用我们的人力物力,把必要办、非办不可的事情,先办起来,把不必办,不能办的事,先放置一边,不办或缓办,这就应该是我们今天办事用人的原则”。^⑥

①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 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86 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3 页。

⑤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2 页。

⑥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45 页。

在宣传共产党的战时教育政策、进行战争精神动员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一方面杀我同胞、掠我资源,另一方面又用宗教迷信、封建道德、愚民教育来麻醉我们的精神。针对这种情况,胡乔木说:“敌人既然对我们进行了这样的精神攻势,我们的思想战线自应给以双倍的回击。”^①他认为,首先我们要大力宣传唯物论,“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②，“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③其次,要实行战时的教育、文艺政策。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弊端有四,其一,它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的产物,不合于中国需要,其二,它是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产物,不合于中国民主根据地的需要,三是它是和平时期的产物,不合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四是它是大城市的产物,不合于农村的需要。今天我们的教育,必须考虑“我们是在中国,在民主根据地,在战时,在农村”。^④抗日战争需要有适合抗战需要的教育,因此,他提出要“打破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⑤新教育的方向就是与战争、与革命相结合。“只有把我们今天的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战争与革命相结合,才是生产健全公民与健全干部的唯一方法”。^⑥“根据地的教育是为人民的,为人民的战争与生产的,所以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但在政治课和政治学校中,而且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72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72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72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19页。

⑤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35页。

⑥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34页。

在文化课和文化学校中,都应该首先被着重”。^①他还认为在群众教育中,农村中的成人重于儿童,在成人教育中,在职干部教育又摆在第一位。之所以如此,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②之所以在职干部是第一位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对全国人民,今天肩头上的责任空前地重大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党已经有了正确的政策之后,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在教育形式上,胡乔木认为可采用多种,如冬学、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短期学校、训练班、识字班、小先生制等,干部教育也可采用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轮训制等等。关于战时的文艺方向、文艺政策,胡乔木认为,“应该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的问题作为创作的主体”^④,文艺工作者要面向群众、深入群众、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其形式为群众所接受。在思想界中心任务是“彻底打跨和消灭法西斯主义……不容在我们的抗战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种”^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⑥

在分析战争形势、批判妥协投降,坚定必胜信念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亲日派汪精卫患了恐日病,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言战必败,最终投敌叛国,当了汉奸。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日本诱降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26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25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51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96页。

⑤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1页。

⑥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1页。

下,蒋介石集团虽未投敌,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此,胡乔木也予以坚决地揭露和批判。1939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1卷第6—7期发表了《严重注意投降妥协言论》的文章,驳斥了汪精卫的抗战必败论、主和论。他说:“凡是抗战所需要的,投降妥协派没有不加以反对的。”^①而投降派所宣扬的,“每一点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特务机关所设计、所欢迎、所响应的”。^②他要求全国人民和爱国青年,要“在全民族面前大声疾呼——唯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才能制止亡国灭种的空前大祸啊!”^③

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妥协动摇,胡乔木也无情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延安时期,他先后为《解放日报》写了《国民党缺少什么?》、《出路和迷路》、《闻捷》、《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请重庆看罗马》、《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评国民党大会文件》等社论。在《国民党缺少什么?》一文中,他说:“国民党缺少什么?飞机大炮吗?干部人才吗?抗日办法吗?是的,这些都不算顶多,但是最缺少的,却是民族的信心。”^④为什么国民党缺乏民族信心,胡乔木认为这是因为它“把自己的同胞看成不共戴天的寇仇”。“把同胞看做异胞,就自然不能从人民身上看出民族的无限力量和无限前途”。^⑤他批判说:“你们在皖南事变和各种反共活动中是何等地勇敢!你们在制造谣言和各种反共舆论中是表现了何等的创造性积极性!你们既然毫不迟疑地把人民和人民的先锋队都描写做奸匪叛贼,你们对于民族还能有什么信心呢?”^⑥“为了对付共

① 《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268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268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8页。

⑤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页。

⑥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页。

产党和人民,你们建筑了一个何等庞大的机构……在强敌压境之际而采取这种政策,无论在古今中外,都绝对说不上兴国建国,而只能祸国亡国”。^①他接着说:共产党以宽大为怀,“虽然受到一切不能忍受的敌视,但是只要你们继续抗战,共产党和人民还是爱护你们,还是愿意和你们合作的。”^②在文章的最后,他告诉国民党为什么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总能风雨不动,安如泰山,“共产党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此始终和全民族的伟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奋斗”。^③

在批判妥协投降论调的同时,胡乔木又认真分析了当时的苏德战争与中日战争的战局。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开战初期,苏联的失利引起人们极大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苏德开战仅一周之际,就大胆地、客观地分析了战局发展,为《解放日报》写了《苏必胜,德必败》的著名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从4个方面分析了苏德战争,最后的结论是苏必胜,德必败;中必胜,日必败。这篇文章,对当时扫除悲观情绪,树立人们必胜信心起了很大作用。中必胜,日必败,但胜利也不是等来的,他告诫国人“抛开一切悲观怀疑、自暴自弃的观念,收拾一切守株待兔、一心以为鸿鹄将至的幻想,大踏步地加强我们的战斗!我们不能再徘徊不前……要知道真正的民族自由,唯有依靠自己的流血才能取得”,他还告诉国人:“尽管抗战的途程坎坷不平……但中国抗日战争的革命烽火,是无论如何不会被那些政治阴谋家所扑灭的。”^④我们“足以击破任何投降妥协的阴谋而获得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9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0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3页。

抗战的最后胜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底的原则,绝不轻易”。^①他还教育青年,“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②

胡乔木在抗日战争中,挥毫疾书,叱咤风云,以他尖锐泼辣的文笔,写下了多少痛快淋漓、令朋友叫绝、令敌人丧胆的檄文。多少人读了他的文章后,理解了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又有多少人读了他的文章后,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战争。

二 胡乔木对抗战胜利伟大意义的研究和阐述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作为历史,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但作为亲身经历抗日战火的胡乔木,每当想起就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今天,回忆起当年的那种如火如荼、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战斗生涯,谁能不感到无比的自豪呢?谁能不努力恢复和发扬抗战时期的优良作风呢?而对于前仆后继,英勇殉国的无数先烈,又谁能不肃然起敬……以他们为终身的楷模呢?”^③ 亲身的经历,使胡乔木对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首先,他认为八年抗战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

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军队数量、装备等方面,都无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3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4页。

③ 胡乔木:《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1978年8月7日。

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 95% 以上的民众,大打人民战争,从而使共产党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至 1943 年,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已抗击侵华日军的 64%, 伪军的 95%, 其党员已由战前几万人发展到 120 多万,军队由几万人发展到 91 万。尽管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仍比不上国民党,“但是它们所代表的质量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方是蓬蓬日上,另一方是飘飘欲坠”。^① 由于国民党当局战后执意发动内战,结果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直接导致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走上摆脱了任何帝国主义统治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独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因此,胡乔木认为“八年抗战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的确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②

其次,他认为八年抗战根本改变了国际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是何等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不仅要侵吞中国,而且要吞并亚洲,独霸世界。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在国际监督下,由日本议会通过的《和平宪法》也明确宣布:“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与武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不承认国家的宣战权。”东条英机等 7 名战犯也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新中国的成立,“一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远东的旧形势和世界的旧形势,也都一去不复返了”。^③

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有如此重大意义,所以战后,胡乔木主张要加强学术研究,他说“抗日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既然有

① 胡乔木:《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7 日。

② 胡乔木:《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7 日。

③ 引同上。

如此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的学术界首先是史学界就责无旁贷地需要加以充分研究”。^① 胡乔木认为,解放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出版了一些篇幅较小的单行本,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已写出初稿,多卷本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积极的编写中。但胡乔木认为:“写几部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也一定能够写出几十部以至几百部著作来。”^② 他希望“能够有大量的研究家、著作家投入到这个在很多方面尚待深入探索的领域中来……我们不但希望中国的历史研究家和著作家,而且希望日本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家和著作家,及其他一切有关国家的严肃的历史研究家和著作家,能够共同努力,利用各自所掌握的一切真实资料,为这次战争写下有悠久价值的科学巨著”。^③

借抗日这部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胡乔木的一贯主张。1985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胡乔木首先提议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一方面表明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立场,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题材”。^④ 他说“对抗日战争,现在50岁上下的人还有印象,还能了解,但对年轻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了。因此,抓住抗日战争这个题材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⑤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他还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主导意见和具体措施。

在总体方针上,他认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国共双方对战争的

①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②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30页。

③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30—231页。

④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46页。

⑤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46页。

贡献。他说：“过去讲抗日战争，只讲共产党方面，很少讲国民党方面，这不全面。国民政府是片面的、消极的抗战……在国民党中间，也有不少人是抗日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出来。”^①当然他也反对，在讲国民党抗战时，夸大其词，看不到其消极的一面。对中日关系也是如此，既要看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一面，也要看到中日人民世代的友好往来。

胡乔木不仅提出纪念活动的总体方针，而且还详细拟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如请新华社等单位组办中日邦交历史展览，以图片、实物等形式，全面叙述一千多年两国邦交的历史。在公开展出前，胡乔木亲自到中国美术馆进行审查；请孙平化、刘德有两位同志撰写了《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专文，阐述 1949 年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及有关人士，为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巨大努力。写作前他曾约二位同志面谈，提出写作总体构思和具体意见，对初稿又做了细致的修改，并亲批《人民日报》发表为组织抗战胜利纪念日宣传活动。他指示宣传部门，9 月 3 日那一天，除中央召开大会以外，首都各报都要发表社论。不仅如此，全国各省的报纸都要有自己的社论，不能单转载《人民日报》的，全国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都应该有纪念活动。在乔木同志的指挥和具体部署下，全国在 1985 年 8、9 月份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在声有色的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中，他还亲自动手写文章。^② 1985 年 4 月，胡乔木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为该社出版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我的中国心》写序，他当时身体不好，还是高兴地答应了。他拖着病体看了有关资料写了《发

①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 546 页。

② 该文题为《加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研究》，载《红旗》1985 年第 18 期。

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文中写道:“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几度面临严重的外敌入侵而绝不屈服,这一切让人们痛苦悲愤又催人奋进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正是由中国人民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用自己的泪和血写出来的。在敌人的屠刀、枪口上面前视死如归,深信祖国的生存、利益和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我国人民高贵的民族性格。”^①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伟大战争,为了宣传其胜利意义,发扬其不畏强敌、奋斗不息的精神,告慰先烈,鼓励来者,胡乔木作了重大贡献。

三 胡乔木与倡导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如今在卢沟桥头古老的宛平县城里,耸立着一座规模宏丽的建筑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座占地3.6万平方米的大型纪念馆,每天都接待数以千计的参观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兴建,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建馆十几年来,有20余万国外观众慕名前来参观。许多国际上的知名学者,政治家、军事家,在这里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国际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还有不少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政界要人,在参观抗战馆时,面对着大量历史资料,深深地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发自内心地表示歉意。

这座纪念馆从倡导到筹建,从设计到展览内容,再到纪念馆的发展,始终得到了胡乔木的关怀。

该馆的筹建,始于1983年,当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跳出

^①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47—548页。

来,企图否定其侵华历史,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同时缅怀先烈,砥励后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胡乔木向中央提议在宛平城内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1983年12月19日下午,胡乔木亲临卢沟桥畔,考察了卢沟桥和宛平城,详谈他的筹建设想,1984年6月6日,胡乔木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要求中央部门牵头筹备……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①

经胡乔木多方协调,1984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朱穆之同志任主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白介夫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汉同志任副主任。北京市政府也专门抽调精干,成立了基建指挥部,具体负责馆舍建设。

胡乔木同志当时工作十分忙,但他始终关心着纪念馆的筹建,经常听取有关汇报。在建筑艺术、建筑布局、陈列大纲的内容、展厅布局甚至观众参观路线等方面都一一过问,并提出具体意义。

在他的关怀指导下,纪念馆于1987年7月按时建成,此时的胡乔木,又在谋划纪念馆的发展。他认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心,应当开展多方面的、深入的抗战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工作,团结全国的专家学者,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他的倡导和指导下,1988年7月5日,纪念馆首次举办了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1989年4月,胡乔木带病再次来到纪念馆观察,并提出:首先,“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成为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要使全国人民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程中撷取精神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团结”。^②其次,“抗日战争纪念馆应当逐渐

①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

②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78—279页。

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心,应当团结全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人员,深入总结抗日战争历史教训,澄清历史事实,明辨历史是非,把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搞深、搞透,特别是要与国际上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建立广泛的联系,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格局中去考察研究。对于否定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作用的观点,要用大量翔实的有说服力的资料去驳斥。对于否定侵略性质,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逆流,要以实事去批判,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① 还要“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采集、整理……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活资料、活证据”。^② 第三,抗日战争纪念馆还应当成为一座联系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桥梁,成为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爱国人士团结的纽带”。^③ 1991年1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纪念馆牵头,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抗日战争史学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专家学者欢聚首都,商讨全面组织撰著抗战学术著术。胡乔木当时病重,不能亲自出席,就在病床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在他的关怀下,我国第一本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专刊《抗日战争研究》,于1991年9月正式出版,在海内外公开发行。

四 胡乔木晚年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首先,批判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一些主持正义的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如《日本新

①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79页。

②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79页。

③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79页。

史》等,贯彻了和平宪法精神,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做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论述。书中没有回避日本当年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对在战争中的奸淫、烧杀、掳夺等法西斯暴行,也如实做了某些论述。这些历史教科书,战后多年一直被日本高、初级中学广泛采用。但从 1955 年起,日本自民党的前身民主党的某些人,即提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攻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有“偏向”,如未强调天皇的地位,及培养学生对天皇的“敬爱之念”,未对学生灌输“向海外发展的使命感”等等,要求对历史教科书作重大修改。翌年 3 月,自民党向国会提出“教科书法案”,企图强化国家对教科书的统制。

日本右翼势力这股要求修改教科书的逆流,其目的在于蒙骗日本后代,图谋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国内进步学者和亚洲被侵略邻国的强烈批判,右翼势力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其翻案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其要求作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日烈,日本右翼势力要求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呼声也随之日益嚣张。其修改意见有要求神化、美化天皇,尽量淡化日本对外侵略及暴行的论述;要求肯定和强化日本自卫队,以便使复活军国主义合法化。这些篡改历史、复辟军国主义的意见,一一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接受。文教省要求教科书的编写,须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改为“进入”,要求对日本暴行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在哈尔滨等地残害战俘、在占领区强暴妇女、抓慰安妇等等,一一作“淡化”处理。1982 年秋,贯彻文教省上述指示,由日本右翼分子编写的《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合格,出版发行。

此时,胡乔木正在青岛疗养,当他听到外电有关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报道后,极为愤慨,他立即打电话给他在北京的秘书黎

虹,指示将他关于组织必要的抗议的具体建议迅速转告中央有关方面,他自己也立即动身回京。回京后,他立即写了《警惕军国主义的逻辑》一文,痛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种种谬论。文中开头第一句就提醒我国同胞和亚洲各国人民:“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强行删去对中国侵略的字样而改为‘进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的重要信号。”^①进而他又指出“日本文部省篡改侵略历史的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日本内阁中有很多长官或大臣是公开坚决支持文部省的篡改的”。^②胡乔木赞扬日本各界批判右翼分子篡改历史的义举,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乃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接着,胡乔木以锋利的笔触,一一严厉批驳日本右翼势力的篡改侵略历史的重要观点、论据,如针对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叫嚷“日本在‘进入’外国的当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如果把‘进入’说成是侵略,就是歪曲事实,孩子们就会说(日本的)祖先们干了坏事,不尊重他们了”。^③胡乔木指出:“按照松野长官的逻辑,世界历史上本来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侵略的事实。因为历来的侵略者,连同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中与日本结盟的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内,从来在‘进入’外国的当时,一概‘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看来,不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应该修改,而且德国、意大利的历史教科书也应该修改,凡是‘侵略’都应该改为‘进入’。否则,‘就是歪曲事实’。而且德国、意大利的孩子们就会说,他们的‘祖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645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645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646页。

先干了坏事,不尊重他们了’。”^① 针对日本文部省大臣小川平二关于“‘进入’一词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客观词汇”的谬论,胡乔木驳斥道:看来“‘进入’一词,实乃是最科学的词汇,而科学是无国界的,理应为全世界所接受。据此,不但在德国、意大利的历史教科书中,而且全世界的一切教科书、一切书籍、一切辞书中,都应该将不客观、不公正的‘侵略’一词永远消灭,而一律代以不包含价值判断的‘进入’,而不致引起任何价值判断的纷扰。这样做了以后,不但人类历史将一概变得客观公正,而且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被‘进入,’这岂不是日本长官造福全人类的空前伟大丰功伟绩……他们的这种伟大的科学发明,实在理应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不但将来的日本的孩子们,而且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所干的‘好事’啊!”^② “可惜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日本的这些长官和大臣们的奥妙的学理。他们竟不以受‘进入’为光荣,或对于受‘进入’采取超然的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偏要执迷于价值判断。他们坚持认为:侵略就是侵略,根本不是什么‘进入’。”^③

文章最后,胡乔木说:“按照这些长官们的逻辑,世界上的国家必须分为两类:一类享有天赋的自由向别国‘进入’的权利;另一类却注定只有受‘进入’的义务。只有这样才‘客观公正’,但真不知受这种‘客观公正’教育的日本孩子们,将要受到怎样可怕的价值判断的毒害啊!”^④

1982 年 8 月 2 日,《解放军报》第 1 版以“本报评论员”署名发

①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46 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46—647 页。

③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47 页。

④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第 647 页。

表了胡乔木这篇重要评论,揭开了我国舆论界、宣传媒体揭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帷幕。这之后的《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忠言逆耳利于行》、《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前前后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政府应当切实纠正错误》等社论、短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表《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的评论文章,至于全国各报刊,在这个时期以不同形式发表的揭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文稿,铺天盖地,不计其数。

为了进一步反击日本文部省肆意篡改历史,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胡乔木指示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华社摄影部、外文出版社等单位协作,组织了《日本侵华图片展览》。对展览的200多幅大型图片的内容,编排、文字说明等,胡乔木都亲自一一审查。这些展览延续两三个月之久,中外观众络绎不绝,反映十分强烈。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充分倾听中方对教科书表述的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根据新的审订标准,对教科书中的“侵略”、“南京大屠杀”的修改作出纠正,至此,同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斗争初战告捷,但斗争远未结束。

其次,组织批判《“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

日本文部省1982年修改历史教科书,其要害之处,一是否认侵略,一是否认日本侵华暴行。后者中否认南京大屠杀更是重中之重。那些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对于南京沦陷后屠杀中国军民达30万之多,更是百般抵赖。在这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中,日本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是其急先锋。

田中正明亲自参加了侵华战争,他是南京大屠杀总头目、大刽子手、原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的秘书兼随军记者。1984年5月,日本教文出版社出版了他臭名远扬的《“南京大屠

杀”之虚构》一书,在这本 20 万字的书中,他把日军在南京进行的疯狂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惨无人道的暴行,洗刷得一干二净。他在书中说:日军占领南京后,士兵“军纪严明”,“一旦发现强奸,就要枪决”,那怕拿一只绣花鞋,也要被“起诉”^①,“城内未发现一具尸体”、“民房很少被烧毁,几乎都安然无恙”。^②认为日军在南京屠杀了 30 万人之说,不过是中国人“白发三千丈的夸大”。^③田中正明的这本书,其目的很清楚,一是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同时也是为了吹捧他的上司松井石根。书中对日本侵略历史的任意篡改,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的极端蔑视,简直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胡乔木对这本小册子的出笼及其所起的恶劣社会影响,极为重视。本来田中正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由于他的反动思想、观点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日本官方主流派的思潮,因此,胡乔木认为必须予以坚决地揭露、批判。1984 年 11 月 16 日,胡乔木在给胡启立、姬鹏飞的信中说:“中日关系目前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应大力促进这个势头继续向前发展。日本政府内和资产阶级内有一股势力要恢复军国主义,其终极目的是要修改宪法,重新走上扩张道路,为此他们就要为侵华战争以及对东南亚的侵略和整个太平洋战争翻案,但他们的这一企图当然要受到国内种种民主力量的抵抗,这一斗争将是长期的。我想我们对日本民主力量自应声援,涉及否认对华侵略的逆流更不能不给予适当的回击。”^④对《“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的批判,他具体提出以下步骤:1. 可以由《世界知识》或《望》一类刊物或南京《新华日报》发表署名的

① [日]田中自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中译版,第 200 页。

②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 125 页。

③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 284 页。

④ 《胡乔木书信集》,第 605 页。

书评。2. 日本为侵华战争翻案的活动很多,可以委托由军事科学院主持《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人员或专事日本研究的人员在充分掌握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一本中等篇幅的专著予以揭露,书内要充分表现日本社会各界对这股逆流的抗争。3. 可以请我驻日记者对日本各界人士坚持发展中日友好、反对违反两国友好原则的逆流的各种活动,不时写回一些通信,这些通信的重点放在加强两国友好的正面报道方面。反逆流的抗争则放在附带地位。胡启立、姬鹏飞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并做了具体部署。

根据胡乔木的指示,1985年8月16日《世界知识》第16期,以潘俊峰署名刊出《铁证如山岂容抵赖——评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文。而此篇文章初稿胡乔木做了几十处修改,第二稿他又做了20处修改。可以说此文是在胡乔木亲自指导下写成的。1986年1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经胡乔木审改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21万余字,附日军暴行照片50幅,这是我国首部史料翔实,图文并茂,系统全面揭露日军暴行,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著述,极受读者欢迎。

为了从历史上更广泛、更系统、更深入地揭露日本侵华暴行,教育我国和日本的青少年一代,胡乔木在组织批判《“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前后,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

一是要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专著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制造的许多惨案,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五卅惨案、重庆大轰炸、平顶山事件等等,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

二是提出要特别关注保护日军侵华暴行遗址。1982年11月初,当胡乔木在阅报中看到日本《恶魔的饱食》一书作者,感叹中国在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试验场地遗址盖了工厂,仅存地下试验室遗址的报道后,心中极为不安,他立即写信给邓力群,指示其速告黑

龙江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着意保护,并“望文化部告文物局,通令全国查明,定出保护措施和进行宣传教育的办法”。他说“这类事情现在抓已经迟了一大步,但再不注意,则有关文物将永远湮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了”。当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白介夫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提出要建立日军暴行调查组开展调查时,胡乔木极为支持,从调查计划到资金的投入,再到基金会秘书长人选,胡乔木都一一帮助落实。他对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急切关心与远见,由此可见一斑。

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为了使中日友好关系世代健康发展,使过去的历史悲剧永不再重演,这是胡乔木一贯主张。为此,他也做了许多工作。如他在批判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时,不仅指导举办了《日本侵华图片展览》,同时指导举办了《中日友好图片展览》、出版《中日友好画册》。在组织批判《“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时,他强调我们要注意政策,批判都要在不损害中日友好的主流的范围内进行,“重点要放在加强两国友好的正面,反逆流的抗争在附带地位”。

正因为胡乔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十分注意政策,注重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维护中日友好发展的主流,因而历次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邓力群同志曾说:“乔木同志的一生,同我们党的事业和历史融成了一体”^①;其实,他的一生,何尝不是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也融成了一体。

(作者李良志,192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鲁书月,1958年生,邯郸师范专科学校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0页。